

从手抄书谈起

曹景行

实际上，我抄书的本事是从初中开始练就的。那时候书少，好多从图书馆里借来，看到特别有意思的内容就喜欢在本子上摘录几段；倒不是像现在有些孩子为了写文章时引经据典，就是怕以后再看查找不到。渐渐的，抄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长也越来越严肃。我还抄过毛选，大概抄到第三卷。下乡那几年继续抄东西，抄了再转寄别人，跟今天微信里面转来转去差不多。

对我们祖辈来说，抄书本来就是读书人经常做的事情，无非因为印刷术不发达，书少且贵。我受初中老师点拨开始抄书，除了可以对看过的东西留下记录、加深印象，还可以收心和练字。我从小就不喜欢认真写字，经常因字迹潦草被老师批评。抄书确有效果，后来的字就不那么难看了。更加长期受用的，是写字速度加快了，读大学时不用不了几天就能抄一本书。

读大学后除了抄书，还要抄做卡片。在影印技术普及之前，做研究的人一定会做卡片，也就是把有用的文字、数据记在今天手机大小的卡片纸上，便于整理、归类 and 更换。学生在谈到某老师的功底时，或许就会提及他积累了多少万张卡片。我做大学毕业论文时就做了上千张卡片，塞满两个装皮鞋的纸盒，动笔前后不时需要翻看。

因对美国问题感兴趣，除了越来越多看英文资料，我也做了不少英文卡片。到社科院工作后，成天泡在外文资料室，做一百张一扎的卡片用不了几天。那时影印机还不能随便用，难得印几张需由研究所有关主管批准。后来有了一部台式电脑，大概是美国某位学者赠送的，有专门的恒温房间、专门配备的电脑员伺候，一般研究人员碰都不能碰，据说主要用途也就是每个月打工工资单。

英文资料抄多了，我想到学打字。研究所办公室有一台闲置的英文打字机，我向打字员借来，就开始噼噼啪啪学起来、打起来，没多久就可以代替手抄做卡片，打字速度也越来越快。好在平时来办公室的同事不多，不然一定会受不了这种自动步枪连发般的噪音。

除了做英文卡片，我看到特别有意思的英文参考书也会打下一两章，甚至整本，就当做练习打字的教材。这样看起来有点像消磨时间，没想到几年后我去香港《亚洲周刊》打工，正遇上新闻出版行业的革命性变革，英文打字成了我生存和竞争的优势。那时世界各地的中文媒体普遍转用“北大方正”排版技术，原来的排字房被电脑制版取代，记者编辑也感受到电脑化的压力，开始自学电脑打字改稿写稿。公司没人教你，也不会给你时间和学费外面去培训，只有自己利用下班后、放假日学起来。基于已有的英文打字技术，我成为编辑中第一个直接用电脑写稿的，也难免对其他同事有所推动。那时我已经四十五六岁了。

到香港工作后，我再抄录过什么，影印实在太方便了，要什么就印什么。凤凰卫视同事都知道，每天一到编辑部我就会拿着一堆报纸杂志跑进影印间，再拿着厚厚一叠印好的东西出来。时间久了，我对如何对付影印机的小故障也略知一二，竟然获得了“影帝”的称号，还被陈鲁豫写入书中而外传，当然与周润发、梁朝伟远不是一回事。

如今，影印机也用得很少很少了，需要什么资料大都可以在手机上找到，连笔记本电脑都不用随身携带。但也不可能再有当年抄书时那种认真甚至带点庄重的感觉，也不可能像当年那样把想记住的东西一笔一刻刻录到脑中。以后如有空暇，我也许会重新开始抄书或抄录别的什么，至少可以延缓脑和手的退化。你会试一下吗？

在波士顿的秋日，我终于来到了瓦尔登湖畔。这是自 20 年前就开始沉淀在内心的一座湖，因为美国作家梭罗的散文集《瓦尔登湖》而在中国享有盛誉，我想但凡对文学和自然的生活有兴趣的中国读者，都曾经借由这本书而试图了解和探索生命的另一种可能：一种摆脱现代科技理性和城市生活主宰个体灵性的渴望，回归自然与重新审视自我生命的自觉，以及一种类似于米兰·昆德拉所言的“生活在别处”的乌托邦想象。因此，这座湖就几乎成了每一个到达波士顿的中国文艺分子的朝圣之地，甚至其在中国的知名度远远超过在美国的知名度。

梭罗在瓦尔登湖的四季素描里曾经这样描摹秋日：

秋天里，在这样一个晴朗的天气中，充分地享受了太阳的温暖，在这样的高处坐在一个树桩上，湖的全景尽收眼底，细看那圆圆的水涡，那些圆涡一刻不停地刻印在天空和树木的倒影中间的水面上，要不是有这些水涡，水面是看不到的。在这样广大的一片水面上，并没有一点儿扰动，就有一点儿，也立刻柔和地复归于平静而消失了，好像在水边装一瓶子水，那些颤栗的水波流回到岸边之后，立刻又平滑了。一条鱼跳跃起来，一个虫子掉落到湖上，都这样用圆涡，用美丽的线条来表达，仿佛那是泉源中的经常的喷涌，它的生命的轻柔的搏动，它的胸膛的呼吸起伏。那是欢乐的震抖，还是痛苦的颤栗，都无从分辨。湖的现象是何等的平和啊！人类的工作又像在春天里一样的发光了。是啊，每一树叶、桠枝、石子和蜘蛛网在下午茶时又在发光，跟它们在春天的早晨承露以后一样。每一支划桨的或每一只虫子的动作都能发出一道闪光来，而一声桨响，又能引出何等甜蜜的回音来啊！在这样的一天里，九月或十月，瓦尔登是森林的一面十全十美的明镜，它四面用石子镶边，我看它们是珍贵而稀世的。再没有什么像这这一个躺卧在大地表面的湖沼这样美，这样纯洁，同时又这样大。秋



笔会

灵魂中的庇护所

（凸版）

〔泰国〕帕纳文·皮安州波

“大哥，你别走。”这个他没有依她，他走了，再也沒有回来。

起初，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知道了。为了不让我祖母触景伤情，家里人偷偷烧掉了这个亡人的照片、衣物。但总有漏网之鱼，比如，那张躲在螺钿匣子里的小照，比如，在几十年后会和我相遇的那两本旧书。这书，是我姑姑的宝。她一直珍藏着它。搬家、迁徙，从中原到黄土高原，从黄土高原到渤海之滨，不离不弃。1966年，“破四旧”，惶恐中，目不识丁的祖母把家里的旧书偷偷付之一炬，而这两本书，被我姑姑悄悄地藏在了她睡觉的枕头套里，她枕着它们，枕着她大哥最后的痕迹，最后的遗留——这是她亲爱的大哥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唯一证据。

后来她分配工作，离开我祖母离开我们这个家，去往唐山，做了一名高炉前的炼钢工人。她学冶金，是她的兄弟姐妹、堂兄堂姐妹中唯一一个没有学医的人，似乎，她离她的长兄最远，可唯有她，保存着那证据：她的书，他留在扉页上的字迹。大地震到来时，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从废墟堆里扒出了她的儿子，扒出了邻居，扒出了更远的邻居，大雨之中，她十个手指鲜血淋漓。最终，有一天，她扒出了她的书，它们完好无损，她哭了。

从前，从唐山到太原，乘火车，天亮时，远远地，会看到车窗外巍然挺立的双塔，那是太原的标志，看到它，就知道是到家了。这一次，我姑姑一家给我父亲庆寿，仍然是坐了夜行的火车。天蒙蒙亮，我姑姑就趴在车窗向外眺望。她望了很久，并没有看到她想看的景色。她遗憾地在心里说了一句，“大哥，抱歉，现在看不到双塔了。”

她和大哥一起回家。

湖畔寻思录

唐小兵

的爱好，从无数他人的生命中步履匆匆，却从未能留下一鳞半爪的印迹，与此同时又在哀叹生命的孤独，时刻陷溺在一种躁动不安四面突围的情绪之中。法国作家莫迪亚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解释为何他的作品都聚焦在“家庭”、“回忆”、“二战”和“自我”等主题：“因为生活的偶然性……还有一种恒定不变性，那就是你看待事物的眼光。我常常会感受到我那一代人与上一代人相比，专心能力下降了。我想到了普鲁斯特或劳伦斯·迪雷勒以及他的《亚历山大四重奏》。他们生活在一个能够更加集中精力思考的时代里，而我们这一代人，只能是支离破碎的。”而在加拿大哲学家泰勒的笔下，随着世俗时代的兴起，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基于传统共同体的道德视野日益弱化，个人便陷溺在一种“可悲的自我专注”之中。泰勒认为，“这种个人主义导致以自我为中心，以及随之而来的对那些更大的、自我之外的问题和事务的漠然，无论这些问题和事务是宗教的、政治的，还是历史的。其后果是，生活被狭隘化和平庸化。”前者认为这个时代的个人已经丧失了“自我专注的能力”，生活变得支离破碎，而后者认为当代人过于关心自己，缺乏更多的价值资源来反省自己，从而从更长远的道德和文化传统来看，就显得极为可悲可怜。

《瓦尔登湖》所展现的就是一种既超越了“可悲的自我专注”，又不是“支离破碎”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那是一种完整意义的个人的生命和心

灵的展现，是在探索自然奥秘的同时，与自然和解，向自然致敬。在日常生活上，梭罗信奉的做减法的极简主义，在精神生活上，梭罗展现的是做加法的完美主义。瓦尔登湖畔的生活，让劳作回归到了它的本意，不再是异化与剥削，而是人在安顿自己的生命时展开的形式。劳作是辛苦的，但是喜悦的，直接劳动者是具有尊严的。劳动不是在扼杀思想，劳动反而是在激发思想的可能，让身体的感性在自然的怀抱中释放和安顿。天地之间，手舞足蹈的个人，特立独行的个人，沉思默想的个人，都具有一种放荡不羁的野性与自然。自然不是等待被超越的对象，自然也不是人类审美的客体，万物齐一，天人合一，它是内在于人类生命的精神性存在。这也是从文先生在反思现代都市文明时所念兹在兹的“野蛮的活力”。毫无疑问，在一百七十多年前的湖畔生活的梭罗，肯定会面临诸多日常生活的困局乃至绝境，也会有来自暴风雪天气的压迫，他也许也会有一些紧张乃至焦虑，但从哈佛毕业博览群书的他，拥有极为丰厚的人文思想资源，更有强韧而敏感的精神世界，这从《瓦尔登湖》极为广泛的知识趣味可管窥一斑，让他足以应对对自然和人生的挑战。这让我想起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所塑造的美国个人主义的形象，也想起了诗人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上的生命悲剧。二者似乎都是有一点悲情的抗争者形象，而《瓦尔登湖》所展现的更多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相知相守的景致，孤独却不寂寞。

梭罗曾说，“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我不希望度过非生活的生活，生活是这样的可爱；我却也不愿意去修行过隐逸的生活，除非是万不得已。我要生活得深深地把生命的精髓都吸到，要生活得稳稳当当，生活得斯巴达式的，以便根除一切非生活的东西，划出一块刈割的面积来，细细地刈割或修剪，把生活压缩到一个角隅里去，把它缩小到最低的条件中，如果它被证明是卑微的，那末就把那真正的卑微全部认识到，并把它 的卑微之处公布于世界；或者，如果它是崇高的，就用切身的经历来体会它，在我下一次远游时，也可以作出一个真实的报道。”这多像一个宣称有意义的人生不一定是要过得更美好，而是要生活得最丰盛的存在主义者的形象啊，却又没有存在主义的虚无与荒诞。即此而言，梭罗不朽。

（今年是梭罗诞生 200 周年）

书房二题

周 实

朋友的书房

一个星期天，去一朋友家，碰见他正整理书架，陈旧斑驳的书脊后面飘出年深日久的气息，藏着他的另一世界。

我说我真羡慕他，还有这样一个地方。

他说难道你没有？

我说是的，我也有，但是没有你的大。

他说这是他的投资。书房就是他的地产，藏书就是他的家，各种不同味道的家。今天到这个家里来坐，明天去那个家里走走，随心所欲，畅所欲言，不亦乐乎？

确实，他的书房也就是他的精神家园吧。但是，说到这是投资，我想恐怕已在贬值。

据我所知，目前不少老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拥有庞大书房的，都颇担心百年之后，他的藏书怎么办？

怎么办？有后人呀！朋友笑着说。

子承父业的并不多。那就捐给图书馆！

好多知识都过时了。何况现在一上网，还有什么查不到？

总有一些查不到的。比如某位专家的研究，或者正在研究的资料，或者还未完成的研究……

这些就不是图书了，用的人就很少了，除了接着研究的人。

听说某大学图书馆就接受了四位教授去世后捐献的藏书，还有两位准备捐献，但图书馆的馆员私下里却议论：这纯粹是挤占我们的馆藏啊，

今年十月双节假期，回太原家里为我父亲庆寿。按农历的纪年方式，父亲今年九十岁了。虽然我母亲这些年重病在身，且陷落在重症监护室里已有数月，但是，人生能有几个九十岁？所以，我们还是为父亲张罗了一个小规模寿宴和亲人的聚会。

小姑姑一家就是从唐山来为她的二哥庆寿的。

小姑姑每次来探亲，大包小包，永远是一大堆的礼物。这次也不例外，带了渤海湾的各种海产品，还有极新鲜的河蟹。熬蟹的过程中，有只蟹居然顶起了笼盖胜利出逃，可见其鲜活茁壮。除此而外，另有一包东西，打开来，是两本书，旧书，一本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沙漠丛书”中的一册，掉了封面，名字不详；另一本，则是凌叔华的小说集《花之寺》，新月书店出版，看版权页，上面印着的出版日期是 1928 年，也就是说，它和我父亲同庚，按农历的纪年方式，九十岁了。

打开封面，扉页上有钢笔的字迹，上面写着的大概是购书的日期：1944 年 3 月 28 日。书的主人，是我父亲和姑姑的大哥，也就是我的大伯父。

原来，小姑姑是带来了他们的同胞兄弟，来参加这个亲人们的团聚。

我大伯父，是我们家一个近似传说存在。我和弟弟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的故事：大伯父当年在北京读书，学医，毕业后做了医生。可是没多久，却突发疾病，亡故于北京。那是抗战胜利后，四十年代下半叶的事。没人敢把这样的噩耗，这样的晴天霹雳，告诉我的祖母。于是，全家人合力，共同欺骗着这个失去了长子的母亲。好在，祖母目不识丁，所以，她一如既往地、如常地，在念叨儿子的时候，在牵挂思念的时候，总会接到一封伯父的来信。姑姑叔叔们，把这虚构的远方来信一字一句

也许，就在那时，我突然感觉到这个亡人，是一个亲人。